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外交^{*}

朱炳元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阶段的新中国外交，是新中国外交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外交工作的实践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创造的必要条件和打下的坚实基础，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的外交成就。同样，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开创的中国外交新局面，新中国的外交成就也难以继。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新中国外交、把握中国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的交汇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处理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是我们回顾60多年新中国外交得出的启示。

【关键词】 改革开放 新中国外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作者简介：朱炳元（1950-），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江苏苏州215123）。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史，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同样可以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阶段。这两个历史阶段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是新中国外交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本质上都是党和国家进行新中国社会主义外交工作的具体实践。对这两个历史阶段的外交工作要做出正确的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一、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外交成就不容否定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就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做出了如下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① 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国际舞台。

1.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将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边境，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时我国的情况是，经济复苏刚刚开始，长期战争带来的创伤需要恢复，国家政权有待巩固，军队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面对这样的局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道路研究”（14AZD005）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政治学的资助。

^①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作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①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空前提高。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2. 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项完整的对外政策。这五项原则包括：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②。1954年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我国倡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贯主张和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被列入我国历年发表的—系列外交工作的重要文件中，我国同各国发表的建交公报、联合声明以及签订的各种条约和协定，很多也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双方—致同意的原则正式载入其中。可以这样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世界和平事业做出的贡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引下，中国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得到了蓬勃发展，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3.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在经济上遇到了巨大困难。在国际上，我国面临多方面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这—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实行了“—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边，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特别是苏共20大以后，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中苏矛盾和分歧不断激化。中苏分歧和矛盾的实质，是苏联当时的领导人以“老子党”自居，企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加以控制。中国当然不能接受。苏联搞霸权主义，干涉别国内政，侵略和颠覆别的国家。中国是坚决反对的。邓小平说：“我们—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③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以后，美国仍然对新中国抱公开敌视的态度。—是美国武装插足台湾，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方面通过炮击金门，粉碎美帝国主义妄图制造“两个中国”和“—中—台”的图谋；另—方面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等形式，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有效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美国武装侵略越南，威胁中国安全。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援下，越南人民经过艰苦奋战，最终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以及不怕鬼、不信邪的大无畏斗争精神，体现了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4. “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工作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外交工作也受到“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在周恩来等广大外事

①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82页。

②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8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9页。

干部的努力下，外事工作中一度出现的偏差很快得到了纠正，一些不正常状态逐步得到消除。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国内其他方面的工作相比，外事工作受到破坏的时间要短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中美关系得到缓和，中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对于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邓小平有一段很精辟的阐述：“‘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荡，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① 邓小平的这段话说明，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动荡岁月，也不能全盘否定我国外交战线取得的成就。

二、改革开放开创了新中国外交新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思想，紧紧把握时代特征和历史发展趋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新观点，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1. 中美关系在斗争中曲折发展

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经过谈判，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立即断绝了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但是，美国说一套做一套，单方面制定了《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美之间围绕台湾问题的较量和斗争并没有结束。同时中美两国又都有发展双边关系的愿望，经过彼此的协商和谈判，一些具体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两国的政治关系得到了加强，经济、贸易、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也取得了进展。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还算平稳，一直持续到1983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时说：“冷静地判断一下中美关系，关系正常化以后，我去华盛顿访问，那时是高点。那以后，从卡特后期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开始降低，不仅是里根时期，卡特时期就已经开始下降了。有一段时期降得很低，面临破裂的危险。我们做了准备，准备破裂。因为我们的立足点放在不怕破裂上，所以取得了这一系列进展。”^② 邓小平的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中美建交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脉络，深刻揭示了中美关系倒退的实质以及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

2. 中苏关系由紧张到趋向缓和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武装入侵中国的邻国阿富汗等，使我国面临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构成了影响中苏关系改善的“三大障碍”。中国坚持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消除“三大障碍”，苏联方面总是以种种借口来回避这些问题，所以中苏之间的早期磋商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1989年5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宣布，中苏两党和两国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36页。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①。中苏两国恢复起来的正常关系既根本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对抗关系，但也不是恢复50年代的同盟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友好睦邻关系。两国间这种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世界人民。

3. 祖国统一大业的顺利推进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解决了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在香港和澳门回到祖国怀抱以后，中央政府对这两个地区实行什么样的政策，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香港和澳门从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被英国和葡萄牙所占领，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旧中国的历届政府不敢去解决、也没有能力去解决。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为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统一大业取得的重大成果。香港和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们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外交思想，面对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分别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和实践。

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外交观

第一，坚定地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冷战结束以后，针对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江泽民同志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②我国争取比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

第二，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③对于一切国际事务，应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任何势力损害我国的尊严和主权。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在政治上应该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经济上应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在文化上应当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是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在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

第四，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之间应当在竞争和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在国际事务中要提倡和贯彻民主原则，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集中各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来解决。

2. 科学发展观中的外交思想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6页。

第一，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① 这一主张反映了我国政府和人民追求和平发展的真诚愿望，体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第二，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②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的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我国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第三，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③ 中国将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共同发展。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改善民生，缩小南北差距。中国支持完善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系，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通过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第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按照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我国全方位开展对外工作。在同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上，努力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出现的分歧，推动建立稳定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的发展更好地惠及周边国家。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外交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持新中国外交 60 多年形成的大政方针和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在外交上不断采取新举措，提出新理念，展示新气象。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更具有全球视野、更具有进取意识和开拓精神。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国外交战略已经初步形成。

第一，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理念为和平发展道路增添新内涵。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的大背景下，与和平和发展相联系的合作与共赢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零和思维已经过时，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④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八个字，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有关国际关系讲话的关键词，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天下大势的科学判断，也是我们党尊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明智和正确选择。

第二，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坚定不移的。但这是有前提、有原则和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36 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37 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37 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249 页。

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①这些话掷地有声，字字千钧，从根本上讲清了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三，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准确把握时代潮流的战略抉择，也是坚持和平发展这一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②在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出现反复在所难免。但是，为了实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不断推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第四，在外交工作中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我国的对外交往不仅要追求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且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中国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

四、新中国外交对我们今天的启示

1.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外交

纵观新中国60多年的外交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外交工作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存在重大差别，但是这两个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本质上都是我党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外交工作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外交工作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外交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外交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外交工作。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外交，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意识形态的色彩浓一些，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有些绝对化，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霸权主义超级大国发动战争的危险估计得严重了一些。但是改革开放前外交工作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开创了独立自主办外交的新时期，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效地维护了世界和平；我们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牢固基础；我们不仅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且还改善了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改革开放前30年的外交历史，为改革开放后的外交工作提供了理论准备、人才储备、宝贵经验和营造了大体上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改革开放前的外交历史是改革开放后外交工作的基础，而后一个历史时期是对前一个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没有前一个历史时期，就不可能有后一个历史时期；没有后一个历史时期，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外交工作就难以为继。两个时期的外交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大业之中。

2. 把握中国自身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交汇点

中国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某些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走过的发展历程。现在，我们前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49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05页。

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三个“前所未有”，勾画出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方位。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下，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这些目光，既有欣赏、赞扬，也有疑虑、批评，当然更多的是期待。世界各国人民期待中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我们要把握自身国情和世情的结合点，找到自身利益和各方利益的交汇点，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实践，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寻求一枝独秀或一家独大，而是致力于同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一个日益繁荣和强大的中国出现在全世界面前，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必将为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样的中国，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

纵观新中国 60 多年的外交史，实际上是一部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历史。它对于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原则应当是在推进人类和平进步的事业中坚定而有效地维护、发展我国的国家利益。不能离开自己的国家利益空谈全球利益，当然也不能只讲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损害他国的利益。要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在追求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中国人民福祉的同时，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基于以上原则，我们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把握中国自身利益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交汇点以及我国外交工作的阶段性目标作如下表述。

第一，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以任何理由和形式发动的侵略战争。捍卫世界和平，就是经营、维护和延长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我国的改革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这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第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通过对话合作处理矛盾和分歧，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促进共同发展，在寻求自身利益时考虑对方利益。以自身的发展推动世界的发展，以世界的发展促进自身的发展。不搞冲突和对抗，实现互利和共赢。

第三，积极参与和推进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改革和重建，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稳定提供有利的国际秩序保障，为在全世界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做出贡献。

3.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关系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我们的权宜之计，而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我们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形成的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从来没有动摇过。为了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就不可能有顺利的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因此，选择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当今中国的战略选择，是社会主义国家内在本质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需要在斗争和较量中实现的。当我们的正当权益和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中国人民会义无反顾地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同各种敌对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了维护核心利益而使用武力，不仅与走和平发展道路没有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只有具备打赢反侵略战争的水平 and 能力，才能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如果说，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都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敢于向世界强权“亮剑”；那么，今天的中国强大了，更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我们不仅要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也要明

确地划出中国和平发展的“底线”和“红线”，这就是决不允许任何势力侵犯和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和任何国家突破这一“底线”和“红线”。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要敦促其他国家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大家都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实现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崇高目标。

4. 处理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总量大概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十分明显。中国还由于“八九风波”受到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因此，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韬光养晦”不是像有些人阐释的那样，是收敛自己的锋芒，等待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出来反击。而是指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具体说来，就是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对任何国际问题，都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无疑，坚持这样的外交政策，不仅在当时，就是在当前，也是正确的。

今天，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变得强大了。面对世界对中国的新期待，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应该与时俱进，有更大的作为、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所谓“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就是中国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更加有所作为，为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中国在国际事物中承担责任、发挥作用应当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超出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条件。中国应当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做到责任与实力相匹配，权利与义务相统一。

参考文献：

- [1] 李慎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 [2] 靳辉明、罗文东主编：《当代资本主义新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 [3] 李琮：《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与世界巨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 [4] [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 [5] [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
-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
-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 [8]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编辑：张 桥）

MAIN ABSTRACTS

The Combativeness of the State Theory of Marxism

Yuan Xiuli

The state theory of Marxism is the result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and also an example of coping with the theoretical and political struggles in reality.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put forwar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ome people, under the banner of “neutrality,” “constitution” and “democracy,” try to deny the class nature of the state, negate the leadership of CPC and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and attempt to guide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building with Western view of democracy and a state theory that transcends class. Therefore, we should highlight the combative role of the state theory of Marxism, analyze and refute various incorrect views about state issues, and advanc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theory.

China’s Diplomacy before and after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Zhu Bingyuan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two historical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flects the unity of the holistic and phasal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new China. China’s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today rely on the exploratory practice, valuable experience, 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solid foundation from the nearly 30 years of diplomatic practice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y the same token, new China’s diplomacy would not sustain without the new diplomatic situ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rough reviewing the 65 years history of China’s diplomacy, we may appropriately evaluate China’s diplomacy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dentify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at of the world people, firmly remain on the road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resolutely safeguard our cor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ation and operation.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Economy of Public Ownership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Socialism in China

Xu Chuanchen and Zhai Xuquan

Ensuring the dominant role of public ownership i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ism, th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antidote to economic crisis. At present, the status of public-owned economy is being weakened the wealth polarization has been more and more severe. Obviously, the scale of public-owned economy and the extent of wealth polarization could be quantified with the proportion of public-owned economy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which, through Johansen’s co-integration test, yielded a ratio of -0.1482. Under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e should keep developing and expanding public-owned economy at the macro level with state